

# 没有历史的历史学

——史学危机批判

雷 戈 著

## 自序

这本书写于1989年5月上旬至6月下旬。那是一个既呈现一切又吞噬一切的时刻。既辉煌又暗淡，既令人激动又使人沮丧。它仿佛是五四运动在世纪末的回光返照。它改变了许多东西，毁灭了许多东西，也决定了许多东西。痛苦与绝望是它唯一有价值的结果。痛苦成为对它的反思，绝望成为对它的批判。迄今为止，绝望仍在延续。绝望诚然开启了命运的大门，但我并不认为绝望（本身）就是我的命运。因为我的命运从属于一个更高的存在和一个更大的必然。所以，我不相信幸福与真理永远与我无缘。

到现在，这本书已静静地在一个只有我才会记得和光顾的角落里整整沉睡了四年。它越来越接近世纪末的最后一刻。我发现，越到世纪末，我们就越是能更加真切地理解世纪初的一切（但这决不等于庸俗辩证法所说的，只有老年人才能真正理解年青人，只有衰老的生命才有资格理解强健的生命）。也许，绝对的理解只有在一个世纪的前后两个基点上才能达到最纯粹和本质的程度。好像尼采说过，两座山峰之间的距离总是最近的。世纪的两端就是时间的山峰。如果时间是历史最主要的财富与遗产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加倍珍惜这笔易失的财富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笔沉重的遗产，而不必去无谓地感谢时间的所谓公正和寄希望于历史的所谓客观。可以说，耕耘与收获永远不成比例乃是历

史的一个传统惯例。不切实际地奢望历史的赐舍，乃是不自觉地放弃自己对历史所应有的基本权利。在生命的制高点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对人性的轻率贬斥和对思想的无端蔑视，而是需要重新恢复对怀疑的信心和无畏地保持对真理的热情。也许，只有在经历过真实的历史之后，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才会变得更加真实。幸与不幸全在此不言之中。

时至今日，对我来说，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乃至表述这些观点的基本语言形式似乎都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历史著作的最高标准和最低要求就是必须无条件地绝对尊重历史。在这里，尊重历史，首先就是要尊重自己以前对历史作出的原有判断和评价，即坚持和保证自己对历史所持有的一贯立场和承诺。因此，就自己本身而言，删改无异于篡改，修正无异于背叛。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篡改自己的誓言，我都不会背叛自己的历史。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信仰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忠实于信仰则更似一件壮举。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为这是对自由选择的必然承诺。何况，尽可能地保存和维护思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乃是每一个良知之心所必须遵守的起码的道德原则。毫无疑问，这里面包含有对人性尊严的肯定。

对于每一个诚实的读者而言，这本书里有你所爱的与所恨的，但你却无法保持旁观与中立。如要选择，我宁肯要问心无愧的偏见和真实无欺的片面，也不要厚颜无耻的客观和道貌岸然的中庸（那令人恶心）。这不是宣言，而是宗旨。因为我的目的是真理。而且仅仅是真理。如果真理是我们的目的，那我是不在乎用什么手段的。真理作为目的，尽管它不能完全保证我们的手段绝对合理，但也必将证明我们的人格与尊严不容任何权威与暴力的践踏与侵犯。可谁又能否认，对于真理而言，目的与手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统一的呢？

这本书所经历的折腾反复的次数之多，使它本身自成一种命运。但愿这种命运仅仅属于我们的时代，而不属于我们的后代。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六日

# 目 录

自 序 .....	(1)
<b>第一章 史学史的批判 .....</b>	<b>(1)</b>
一、作为历史学现实开端的史学危机 .....	(3)
二、史学史的悖论 .....	(9)
三、经史合一的神圣境界 .....	(20)
四、生命 .....	(24)
五、方法 .....	(26)
六、形式 .....	(31)
七、怀疑 .....	(34)
八、经验 .....	(37)
九、主观的客观 .....	(42)
十、时代精神的本质 .....	(45)
十一、当代史 .....	(50)
十二、历史思维的逻辑 .....	(54)
十三、三次潮流 .....	(66)
十四、结构 .....	(75)
<b>第二章 史学主体的批判 .....</b>	<b>(81)</b>
一、词语 .....	(83)
二、史前的主体 .....	(87)
三、本体论的主体 .....	(95)
四、神话 .....	(99)
五、悲剧 .....	(105)

六、超越 .....	(111)
七、还原 .....	(115)
八、困惑 .....	(119)
九、选择 .....	(124)
十、自欺 .....	(128)
十一、感觉与意识 .....	(133)
十二、阐释 .....	(138)
十三、哲学 .....	(144)
<b>第三章 史学政策的批判 .....</b>	<b>(151)</b>
一、可能性 .....	(153)
二、起源 .....	(166)
三、文化性 .....	(171)
四、封建性 .....	(176)
五、阶级性 .....	(180)
六、意识形态性 .....	(187)
七、正统性 .....	(192)
八、政治性 .....	(199)
九、制度性 .....	(204)
十、政策与危机 .....	(212)
十一、内容主义 .....	(219)
十二、隐结构 .....	(226)
十三、调节器 .....	(231)
十四、物质性 .....	(238)
十五、常识 .....	(245)
<b>后记 .....</b>	<b>(252)</b>
<b>补记 .....</b>	<b>(254)</b>

## 第一章 史学史批判

本章分析了史学史向史学危机演变的各种基本形式和必然趋势。史学史的无历史性是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史学史的无历史性是史学史的悖论。史学史的这个悖论决定了史学史必然以史学危机作为自己的真正开端和起点。所以，史学危机实际上就是史学史危机。史学史危机实际上就是史学危机的历史基础，史学史危机为史学危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前提，而这个历史前提在史学危机中正逐步展开为一种日益广阔和丰富的并且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哲学规定。它仿佛暗示着史学危机不仅是史学史在现代的合理发展和必然趋势，而且还是史学史本身所固有的周期性现象。





## 一、作为历史学现实开端的史学危机

目前对史学危机所作的任何讨论和分析都足以使人们相信：史学危机并不存在。因为，历史学家的这些讨论和分析本身也早已变成了更加深刻的危机，即新的史学危机。

史学危机毋庸置疑地成为当代历史学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历史学真正地诞生了。

对此，尚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本能性地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以及这个事实所蕴含的全部意义。他们或者过于乐观地把危机视为转机的前奏和过渡，或者不失天真地将危机看成繁荣的某种表现形式，或者轻描淡写地将危机作为一种需要克服的东西，或者顶多对危机持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认为对史学危机的困难性和灾难性不可过于简单化。对于史学危机的否定派、反对派与怀疑派，这里不准备去专门评论，即使连史学危机的肯定派和支持派在心理潜意识中也都对史学危机持一种反对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对史学危机的肯定正是为了对史学危机进行否定，他们支持史学危机的目的正是为了克服史学危机，他们以间接的形式却得到了与史学危机否定派用直接手段所得到的相同的结论，二者殊途同归，在目的上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肯定派的历史学家仍然视史学危机为不祥之物而必须除之而后快，至少，他们把史学危机看成压根不应该出现的东西。他们对史学危机的理解恰恰忽视了历史学自身最本质的特性——历史性，即历史学家没有能够从历史学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出发来反思史学危机的原因。这样，历史学的

无历史性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被掩埋起来，视而不见了。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史学危机理解为一种十分错误的事物，对于史学危机诞生的全部必然性和合理性，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真正意识到了这点。虽然他们的职业就是专门从事于对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的，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自己所从事的科学存在本身所产生出来的危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却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深刻地思考过，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对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把握还全然处于一种偶然的、外在的、形式的层次上，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历史必然性的内部去完整地把握。对于历史必然性必须同样以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方式去理解，才能对必然性本身达到一种彻底的必然性的认识水平。历史学家还没有人能从一般的、外在的历史必然性辩证地返回到历史学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内部来进行纯粹的反思，因而，历史学家对一般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总是流于浅薄和抽象，不是时而表现为神秘的宿命论就是时而表现为机械的决定论。总之，历史必然性在我们这些本身就缺乏必然性思考本能的历史学家手中从来就没有以其原始的、本态的、真实的面目出现过，历史学家彻底地歪曲了历史必然性，历史学家根本未曾意识到，他们的全部工作恰恰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绝对歪曲和否定。实际上，历史学家早已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成了历史必然性的唯一毁灭者，历史必然性葬送在历史学家手里，历史必然性早就应该对历史学家大喝一声“是你们杀死了我”。

由于历史学家没有对历史学存在的必然性的根据作过严格的理性反思，因而，当史学危机象暴风雨来临前的雷电爆发出震耳的轰鸣和耀眼的闪光时，历史学家不是为之困惑，就是感到惊讶；不是惆怅，就是漠然。历史学家好像全都在等待。在等待着一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的到来。本质上，这种东西只有

在遥遥无期想入非非的幻觉中才能到来。所以，就连历史学家自己也实在说不清这种莫须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完全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虚无。不过，它作为一种冥冥之兆却极大地刺激了历史学家对未来的想象能力以及对这种近似荒谬的等待的奇特信心。而史学危机则给历史学家的这种莫明其妙的等待提供了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但这种机遇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这种近似于迟顿和麻木以及浅薄的等待，它还需要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这种东西，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学家尚不具备。也就是说，一个可能的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这种仿佛无聊的等待中将不得不彻底失去他们现有的一切，即，不但丧失掉他们目前存在的现实性，也必将失去他们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即，存在已与历史学家无关。

史学危机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的力量把历史学家推向绝路，置于死地。历史学从此而诞生了。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唯一特性第一次回到历史学家身上，成为历史学自我意识的绝对前提，成为历史学家自我反思的纯粹基础。

这样，可以说，史学危机本身创造了历史学。表面上看来，这是不合逻辑的；但实质上，这却是合乎历史的。在这里，历史与逻辑第一次产生了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是由史学危机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过程暗示出一个真理：在任何时候，历史与逻辑相矛盾的最后结果都必然是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相反。

史学危机本身首先就是历史学的，但这种历史学却是非历史的历史学，无历史的历史学，对于这种历史学存在的绝对荒谬性和虚假性，是史学危机第一次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显现。在史学危机产生之前，历史学家还没有对历史学存在的必然性根据进行过一次历史性的考察，即，还没有对历史学存在的历史性进行过一次必然性的思考，这样，历史学存在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就一同被

遗失在历史学家的意识之外。而对于历史学存在根据的历史性和必然性的完全抛弃本身就本质地暗示着史学史尚未真正诞生，史学史仍然是一个荒谬的虚假的神话，仍然是一种类似于史前史的存在，是一种历史学的史前史，所以，史学危机便使历史学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历史即史学史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内在地决定了历史学的问题也辩证地是史学史的问题。即，二者是同一个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历史学的元问题：历史学是什么？

那么，历史学难道真的是什么吗？

历史学既然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它又怎么能够一直存在到现在呢？其实，历史学并没有存在着。世界上也从来未曾存在过历史学这样一门科学。有的只是一些靠回忆和说故事为谋生手段的夸夸其谈和人云亦云而已。

事实上，历史学目前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自我判断和自我认识的内在根据。它所凭借的手段或是高高在上的抽象哲学，或是低低在下的庸俗政治。在精神世界中，历史学从属于哲学之王，是哲学主人的卑贱奴仆；在世俗世界里，历史学依附于政治暴君，是政治机器的渺小零件。无论在精神王国还是世俗王国，历史学都没有真实的现实的自由和真正的独立的历史。历史学从来都不是一门本质的科学。没有历史怎么能成为科学？不思考历史又怎能成为科学？人们过分天真地相信了历史学家的胡言乱语而将历史学家的谋生手段视为天经地义的唯一科学了。不管怎么说，历史学的实际意义并不比历史学家已说出来的更多。

这个事实证明，史学史是一个真正的悖论，并且，这个悖论乃是真正哲学性的悖论，而悖论的哲学性则暗示出：找出历史学自身独立的历史，这不是狭义的史学史的任务，而是广义的史学史的问题，这种广义史学史即新史学史乃是全部历史学的现实本质。这就是说，新史学史不但是史学的，同时也必然是哲学的，

即哲学的史学史，哲学的史学史的目的就是哲学地思考历史学存在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它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历史学中的哲学史，或历史学的哲学史。

这无疑意味着，全部历史学的问题已集中地表现为史学史的问题。也就是说，史学史不仅具有历史学的实践性，而且也具有历史学的理论性。对历史学自身历史的彻底反思，不但成为一般历史学的首要前提，而且也内在地成为具体的史学史的第一目的。在这个普遍意义上，历史学与史学史现实地统一起来，并使历史学直接成为史学史本身，也同时使史学史辩证地成为历史学自身。它的意思是说，历史学的真正存在的是它自身的独立的历史为基础的，而史学史的真正价值也正是以它作为历史学本身的内涵而获得了普遍的历史学意义。如果——这不是历史学意义的假设，而是修辞学意义的说法——历史学没有自己的历史，那么，史学史就成为与历史学直接相对立、相否定的矛盾形式，这意味着，史学史并不是历史学自身的历史过程，而是一种外在于历史学的、非历史学的虚假形式。这种虚假形式本质地构成了没有历史的历史学的历史，正如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个书名所暗示出的那样：它是作为政治意志的表象而存在着的。这个事实证明，这种没有历史的历史学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这种没有历史的历史学的历史必须彻底终结。

逻辑上，历史学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具有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历史研究的前提却并不存在，这样，由于前提的缺乏，历史学便不可能产生自己的历史。历史上，历史学也唯有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历史研究的结果产生出来的却是历史学的非历史性。如此看来，历史学不但不具有历史研究所必需的自由的逻辑前提，而且也没有产生研究历史所必然产生的真实结论，历史与逻辑都成了与历史学本身相对

立的东西。历史学没有历史，也没有理性。可滑稽的却是，历史学还偏偏异想天开地不断幻想着它总是在包容和兼括着历史与逻辑二者的共同内容。

历史性作为历史学最基本的特性仿佛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好像就从来不曾真正属于历史学的存在。历史学由于缺乏历史性而必然地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令人尴尬的困境。历史学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从来就根本不具有去研究历史的理由和能力，它连最起码的自己的历史都没有。它的研究只不过是把历史变得非历史、无历史、伪历史而已。历史学杀死了历史。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史无真。

## 二、史学史的悖论

历史学一直致力于对历史谎言的揭露，可它没有意识到，它这种揭露本身正孕育着一个更大的谎言，即历史学向人们始终隐瞒了它本身没有历史性的这一基本事实。这不能不是史学史的最大悖论。

每一个时代的史学总是毫无例外地是其统治阶级，甚至是本朝代的统治集团的历史活动的著作表现。这就是中国历史学的本质。这个本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以极不相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构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和线索。引起这个史学层次的形成和破裂的原因，则是经学的阶段性变化。这是中国史学史的基本规律。而经学又可分为古典经学和现代经学，或旧经学和新经学。

史学是为了劝诫，经学是为了经世，二者的目的相同，取材范围相似；不同的是，史学是直接的，经学是间接的。但就其应用速度和方式来说，经学则是直接的，史学成为间接的。因而，经学与史学之间就构成了超越一般学问的天然的统一体关系。

“六经”本身就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份，而孔子又自觉地利用历史著作来作为经世与劝戒的手段，经过孔子整理过的经典则更富于劝戒和经世的意味。因此，当经学被神秘化、教条化以后，就必然借助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随时补充和延续。而历史学则需要通过经学来透视当代政治的内在底蕴，从而把这种内在精神巧妙地转化为具体的、史料化了的外在的事实。在

这里，神形是合一的。而神形合一则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的基本特征。经史之间的这种本质的关系，决定了历史学在封建国家的官方学术的大家庭中，虽然不是嫡长子，但却无疑是最受关心、最受喜爱的宠儿，较之于各种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以及诸子思想都有着更为尊贵和优越的地位，子部和集部只是官方学术中受到冷遇的、低贱的、卑微的庶子；华贵、高傲的历史学是决不会与庶子们建立任何平等关系的。然而，尊贵本身也就意味着危险。历史学的异常发达，不仅是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而且本质上也是历史学所处地位的外在刺激和强制，这就是说，历史学的繁荣是以自身真实价值的丧失为其代价的，历史学越繁荣，它就越无自由。但对于这个历史事实的认识，所有统治者几乎都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的。历代正史的编纂，各种会要、实录、国史的修订，各种著史条例的制订，各种史官制度的分工和变化，无不从这里引发出来，放射成长短不等、纵横各异、曲直交错的史学轨迹，构成一个时期、一个朝代内的史学变迁网。

东汉经学的破产只是外表形式的变化，它的根基依存，它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有着浓厚的血缘家族传统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广大土壤之中而开放出来的思想花朵。魏晋的历史学家们丝毫没有因为经学暂时的、表面的失意而产生消沉情绪，更没有因为玄学的得意和佛学的高涨而稍稍松懈一点对经学的崇拜，仍是执着如一地思考着经学的动向，最后，终于把握了经学的实质，同时，也抓住了史学的精神，从而法典性地确立了二者的根本关系，这就是目录学“四分法”的诞生。它至少具有三个方面意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学研究重心、研究目的和发展方向的理论问题；从官方学术的法统角度保证了历史学确定不移的尊贵地位，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构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骨架。汉代历史学家对



经史关系的认识，虽是自觉的，却是不明确的、不稳定的，还仅仅局限在个别历史学家头脑中。到了西晋便进入一种充分的、反省的阶段，并且它已经扩展为一种普遍的思潮而为广大的学者所接受，尽管“四分法”本身尚处于不完全定型的状态。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先后产生了六部重要的目录著作，其中三部四分法的，两部七分法的。另外，萧梁时还有一种《五部目录》。但由于《隋志》在提及《五部目录》时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故而我们也就无从加以分析。从七分法方面看，王俭全仿刘歆《七略》，几无别裁之例，自无足取，但阮孝绪的《七录》则发凡起例：“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学；六曰《佛录》；七曰《道录》。”<sup>①</sup>亦将经史分别列目，为何不可？这是由于阮氏《七录》将诸子、兵典、文集、技术、佛、道各占一目，客观上势必分散了经史二家的中心地位，从逐渐升级的专制政治的史学政策来看，则是万万不可的。所以《隋志》就对两部七分法目录痛加讥评，而对于四分法则闭口不论，如说《七志》“文义浅近，未为典则”。说《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剖析辞义，浅薄不经”。

就其四分法的意义背后，同样隐藏着这样的内容，面对着历史学日益发达的趋势，统治集团感到了历史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文化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便需要重新调整汉代六分法的文化结构，使历史学在专制政治更直接、更严密、更有效地控制下。这种优越的条件，不自由的环境，矛盾而又和谐的关系是历史学作品数量的庞大、思想的单调的主要原因。企图不断地往那无比宽阔的历史领域无限制的漫延性的扩展，而不是向独立思考的纵

<sup>①</sup> 《隋书·经籍志》